

阿提回忆西藏

《西藏口述历史计划》记录

2012年5月17日，印度达兰萨拉

我在1932年生于康区的新龙县（今四川省新龙县）。虽然我家拥有土地，但是我们可算是牧民。我和我母亲一起住，我父亲住在另一所房子，他娶了我母亲，也娶了我的姨母。由于我父母分开居住，我父亲较少关心我们。我的舅舅是一位僧侣。他负责养活我家，我则负责照顾母亲。

康区的牧民生活

我自小带着牦牛和山羊放牧，没有太多工作。我们大清早便将牲畜送上山，在有青草和清水的地方放牧，有一人要留下看管动物，以免被野狼和野狗吃掉。天黑了，我们便把它们送回以牦牛毛制成的帐篷。夏天时，我们在大约下午六时或七时将牲畜送回家，然后我们为母牛挤奶。

我们接着煮牛奶和晚饭。在我村煮晚饭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，我们泡茶喝，弄糌粑（由大麦烘焙而成的面粉）和肉来吃。我们大约十时就寝，睡前会诵经两至三次，以歌颂多罗菩萨。小孩子不懂经文，他们只看着。妈妈睡觉时，他们也跟着睡。

在天气渐冷时，小偷是一个隐忧，特别在农历9月至10月初秋之时，动物通常都被养得好好的。我们既要防范穷人偷窃牲畜，也要提防野狼觅食。当野狼在日间出没时，我们向它们大喊，把它们吓跑。有时候我们会用猎枪杀死野狼，在我的村庄，每家每户都有枪，拿枪的都是成年人。当时我还是小孩，所以没有枪。

到寺庙生活

我在大约10岁时成为僧侣，并开始学习。在我的村庄内没有学校，所以我到僻静的寺庙，跟一位住在那里的喇嘛学习，一学就学了大概三年。这位喇嘛只教我读经文和佛法，他不会教村中的小僧侣写字。我们只在长大后才学写字。

我有两三个师兄弟，一起跟喇嘛学习。起初，我们曾感到不快，有时候还哭起来。不过几个月后，我们适应了与家人分开的生活，大伙儿一起玩乐，非常愉快。喇嘛是个有爱心的人。我们不缺食物，有肉、牛油、糌粑……想吃甚么就吃甚么。我们在早上学习，趁光线充足时读书。

往后的两至三年，我以僧侣的身份住在寨呼喇嘛寺，那是我们主要的寺庙，属于宁玛派。那段时光过得快乐，当僧侣是十分开心的事。我的家族还有大约四位僧侣，包括舅舅和叔叔。我的日子过得愉快，特别在跟他们一起的时候。

新僧侣在祈愿大会上成为寺庙的一分子，他们被挂上仪式用的围巾，代表他们正式成为僧侣。寺庙为新成员提供丰盛的粮食，如来自理塘县的黄糖，接着在登记册上写上他们的法号。

领导的随从

我是家中独子，所以我不希望当一辈子的僧侣。我要照顾我的母亲，照顾我的家庭。在我的家乡，男丁要当家作主。我认为我该娶个妻子，对自己的家负责任。在十五、六岁时，我决定离开寺庙，回家当牧民。

在新龙县有四位长老，格亚尼·妮玛是其中之一，他领导大概 1700 户家庭，我和他住在同一条村。每当长老外出，他总带着 10 至 15 名随从和助手。长老负责到不同地方考察，和处理纷争。我是长老的其中一位随从，格亚尼·妮玛是大首领，树敌甚多，我们就像保镖一样保护他。

长老要找出问题，调解村民之间的纷争，照顾他们的利益，对敌人保持警惕，同时关注各种议题。长老完成诸多工作，平衡各方利益，所以他很受人尊敬，就像小孩尊敬父母似的。

格亚尼·妮玛处事公正，为人清廉。他从不接受其他人贿赂，决不让任何人透过行贿获益，甚至鞭笞和惩处他们。他很诚实，经常说公道话。

那是美好的时光。百姓的衣食住行完全自由，出门畅通无阻。那时候西藏是人间天堂，百姓过得极其愉快，所有人拥有各自的财产，生活没有任何限制，跟现在迥然不同。在我 24 岁前，西藏是一片自由快活的地方。

中国解放和搜捕

中国人初到新龙县时，由于格亚尼·妮玛仍是我们的长老，他们给予政府官员的薪金。就这样，他得知中国人的计划—解放西藏，没收百姓财产，摧毁寺庙以及喇嘛像。1955 年，格亚尼·妮玛从中国回来，他向我们透露中国人解放西藏的诡计。

1956 年藏历正月，“民主解放运动”展开。中国政府充公我们的财产，也摧毁寺庙和喇嘛像，恨恨地打击西藏人。格亚尼·妮玛以新龙县百姓进行秘密计划，一开始他已决定抗争到底，我们一直秘密地行动，在中国人主持会议时训练防卫军，可惜这行动只持续了 17 天。

当时所有有影响力的人全被拘捕。在浅多尼旺有一座堡垒，用来囚禁新龙县的长老，并他们进行思想教育。在囚禁西藏的领导后，中国人才可以无阻碍地接触村民。1956 年藏历正月十七日，在下午四、五时左右，中国政府打算在一个会议上捉拿我们其中一位长老，派出大约 100 名中国士兵。

西藏人群起反抗，后来有人开了战争的第一枪，我们正式在新龙县跟中国人开战。我们追击中国军队，从甲日藏的宫殿一直追至堡垒。那时候有 1200 至 1300 名格亚尼·妮玛的支持者包围堡垒，我们杀了五、六名中国军人，包括两位军官。由于当时格亚尼·妮玛身在中国，我们没有再杀中国军人，生怕中国政府会杀了我们的长老报复。

康区战役

我们反抗中国政府，因为我们不认同解放运动。每当遇上中国人，双方之间必有杀戮。我们没有任何支援，当中国人让百姓受害时，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枪抵抗。我们从小便使用枪械打猎，枪械是我们交易得来的财产，不属于国家。西藏政府不会提供武器，但是所有人自己有枪。

我们没受过正规训练，只有明确目标，以男丁应战。当中国人让我们受苦，忍无可忍时，我们奋起反抗，并杀死他们。另一方面，他们也杀了我们许多的伙伴。双方都死了很多人，大家变穷了，生活成问题。

当时康区还没有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。新龙县的人奋战至最后一刻。新龙县被占据后，理塘县的人便走出来抵抗。理塘县沦陷了，便换上乡城县的人来战斗。失去了一个地方，另一个地方的百姓醒觉，整个康区是一盘散沙。说起来，如果我们众志成城，团结一致，中国人绝对不会轻易打败西藏人的。

我们的战斗持续了半年，最终保不住新龙县。约 30 户家庭拒绝向中国人投降，包括格亚尼·妮玛家族，我们逃到山中。不论春夏秋冬，我们都没有屋子或营账住宿。有些中国人抢了西藏人的牲畜，我们趁他们放牧时偷袭，然后杀了牲口或其他野生动物来吃。我们没有糌粑或其他食物，在山上的三年仅以动物的肉续命。我们无法把肉煮熟，只能生吃。严峻的难关一直折磨我们。

中国军队的追杀

1956 年至 1959 年间，我们一直与敌人周旋。我们带着妻儿住在森林，敌人来袭时，男士负责抵挡，女士则带着小孩逃离战线。可是我们逃得不远，只能在同一地区游走。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一直追杀我们，大伙儿不分昼夜都活在恐惧之中。

我们一行人继续往北逃亡，且战且逃，到处都有中国人的踪影。自从他们拿下拉萨后，他们在西藏可说是路路畅通。我们一遇上敌人便要开枪攻击，战斗没有特定时间，可以是早上，也可以是黄昏，就连晚上也可能恶战连场。我们跑到哪里，他们便追到哪里。当我们逃到果洛时，中国军队派战机向我们投下炸弹，很多动物和伙伴被炸死，死者之多，难以估算。

中国人最后在安多（今青海、甘肃以及四川部分地区）的鄂陵湖擒获我们。1959 年藏历六月，他们将所有妇孺杀掉，我因此失去了母亲和妹妹。除了侥幸逃出的 18 人外，其他人都不见了，被中国人抓住或杀掉。我们身无分文，只有同伴和马匹。

我们在藏北高原度过寒冬，当时天气很冷，我穿上家乡的传统皮毛大衣，可是我们缺乏毯子，只有马鞍和坐垫。食物方面，我们只能吃动物的肉。有好几次我们找不到任何动物，那就七、八天没有东西吃，仅能喝水。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困难，整个逃亡充满难关。

中国军队不停地追赶我们，一路追至尼泊尔木斯塘。那里没有敌人，因为中国人不能进入。有位伟大的喇嘛叫尼沙尔·堪宝仁波切，他替我们向上主祈福。我们于是将所有枪械毁掉，弃于河中。我们来到印度的菩提伽耶朝圣、向亡者致意，同时谨见达赖喇嘛尊者。

自我们逃离家乡，我们一直与中国人战斗，他们杀了我们的配偶，剩下的新龙县人决定回去与敌人战斗到底。我在木斯塘加入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，起初军队没有组织，只是乌合之众。我在那里由 1960 年住到 1974 年，住了大约 14 年。尼泊尔政府最后解散木斯塘的军队，收走所有武器。我们接着离开。